

梁燕城「中華神學」的理論建構 與「彩虹文化」的理想

■ 李安澤

黑龍江大學哲學學院

梁燕城是當代活躍的基督教文化學者。他早年曾受學於港台新儒家唐君毅、牟宗三，後又求學於當代新儒家大師成中英門下，獲得博士學位。以此學歷，梁燕城對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可謂深造有得。他於上世紀80年代就倡導並積極參與基督教與儒家的對話，引起學術界和宗教界人士的重視。在當代，梁燕城以其別具特色的「中華神學」的理論建構，為基督教神哲學的發展開闢了新的思想路徑。他所主張的基督教中國化的進路，具有更加開闊的國際化的視野。近年來，他標舉「彩虹神學」，在當代宗教與文明對話中獨樹一幟。可以說，梁燕城以基督教為底色，以儒耶會通為標識的文化更新運動，已然成為當代中國文化發展中一道獨特的景觀，引發廣大社會群體的興奮和思考。

一、信仰真道與文化傳統

梁燕城認為，在當代中國做一個基督徒，要深入瞭解和認識中國社會文化的歷史和現實處境，

以基督教仁愛美善的信仰精神，參與中國社會變革的進程。面對21世紀的全新境遇，中國基督教須尋索其在中國社會文化的新定位，反思三個大的問題。其一、如何在新世紀尊重、承擔、檢討和更新

新中國文化？基督教精神要持續地反思融入中國文化的問題。必須廣泛地融合與吸收中西文化傳統，在超越性反省的基礎上，以中國文化作為神學思想的資源，尋求基督信仰生根中國之道。其二、如何承擔中華民族的命運？基督徒須反思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的深重苦難，以恆久的忍耐、寬諒和愛心，醫治民族的內在創傷。基督徒不僅要傳福音，也要瞭解和分擔民間的疾苦，與中國人同行。其三、如何與當前中國社會相適應，關愛每一個中國人？當代中

國在急速發展中產生嚴重的社會不公和貧富不均問題。基督徒須在嚴峻的社會現場作「道成肉身」的神學反省，以實際行動去實行基督徒無條件的愛，特別是關懷和扶助貧困者和弱勢群體。可見，梁燕城是以現實的中國社會文化境遇為出發點，來探討中國基督教當下發展的問題。以上三者也

摘要：梁燕城的神學理論是基督教尋求生根中華文化的理論探索的接續和發展。其「中華神學」的理論建構，首次開啟了完整意義的中西文化精神在形而上學層面的超越性精神的深度會通、對話的嘗試與努力。梁氏從中西文化雙向的反省、批評和互證互釋中開拓出當代中國神學建構的獨特視野。他運用中國哲學的思維方法詮釋基督教的普世信仰和啟示真理，實際上是從一種本位文化的立場致力於中西文化精神深層的比较與融通的神學試探。可以說，梁燕城的「中華神學」乃是當代基督教中國化的一個標誌性和理論成果。

關鍵詞：中華神學；彩虹文化；文化更新；文明對話

是梁燕城構築其「中華神學」的背景和方向。^[1]

梁燕城強調，基督新教進入中國已是第三世紀，必須進行深入的神學反思，以中國人的思維方法，以中國社會文化的處境為起點，來消化和構築聖經真理。他稱之為「中華神學」。可以肯定，梁燕城構築「中華神學」的努力，與其前輩基督教神學家如趙紫宸、謝扶雅等運用中國哲學的名相、概念來闡釋基督教的精神和思想要義，其基本的理路和方法是一脈相承的。他們都是沿襲了歷史上利瑪竇開創的「文化適應」的模式和思路，是基督教中國化的思想路徑在新時期的繼續和發展。但他更傾向於從思想方法的突破來推進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融合，表現了顯著的理論進展和躍升。可以說，梁燕城構建「中華神學」的思路是雙向的。他一方面強調以基督教超越性的信仰和精神，對中國傳統文化作深刻的神學反思；另一方面又強調神學思考必須透過中國思維的理解以及當代中國的現實境遇和背景。要而言之，梁燕城經過對中西文化雙向的批判思考，其「中華神學」的理論建構凸顯出基督教的普世精神和價值真理與中國文化傳統乃至現實處境的結合。^[2]

顯然，梁燕城「中華神學」理論的標出，表達了當代中國本土神學家獨立構建中國基督教神學理論體系的雄心 and 抱負。為此，他區分了「基督信仰核心真理和價值」與「基督教文化傳統」。他指出，所謂「基督信仰核心真理和價值」，是指基督教聖經的基本信仰乃是上帝的啟示，其核心內容在於認信上帝是天地人乃至宇宙萬物的造物主，是一位有位格、有性情的至上神。而人類以自由意志選擇了與上帝隔離，產生了罪的狀態。上帝乃道成肉身成為耶穌基督，上十字架為人類贖罪，才使天國的博愛與美善在地上出現。所謂「基督教文化傳統」，則並非普世性真理，而是基督教信仰傳到一些文化區域，人們對普世真理的文化詮釋。在歷史上，基督信仰曾傳到不同的文化區域，遇到不同的問題，按照獨特的文化思維和處境建立其神學，因而產生「基督教的文化傳統」。在中東、印度和歐美均有基督教的文化傳統。由於基督信仰最早傳入希臘羅馬文化中，經過幾百年的文化融合，基督教已成功生根於西方文化之中，並成為西方文

化的源泉和一個組成部分。目前，在基督教所有的文化傳統中，以歐美的傳統最為龐大，也最具代表性。但必須認清，這是基督教普世真理的西方文化詮釋，並不等於基督教的普世真理。梁燕城將基督信仰的普世真理與基督教文化傳統區別開來，為中華神學的理論建構掃清了藩籬，也使其理論建構具有了可靠的基礎。也就是說，歐美的基督教文化傳統可以成為構建「中華神學」的借鑒和思想資源，但不可以成為摹本。「中華神學」只能建立在基督教普世信仰和核心真理的基礎之上。^[3]

梁燕城認為，西方神學慣於運用概念化、理性化和形而上學的思想方法構建和組織聖經真理，將上帝置於一個實體化的思維框架。「中華神學」須正視中國思維不重抽象性的邏輯思維，卻注重整體性、和關係性的具體真理。因此，建構「中華神學」的焦點問題與西方神學有很大不同。必須從聖經真理出發來反思和處理中國哲學的「終極真理」問題，也就是以基督教基本信仰的立場，以性情化、位格化的上帝理念為依據來安排中國哲學的本體觀念，如道家的「道」、易經的「太極」、儒家的「天命」、佛教的「空」等思想和理念。「中華神學」須以中國固有的儒釋道文化傳統和中國人習慣的思維方式來消化和理解基督教的基本信仰和普世真理。就其具體內容而論，「中華神學」須以神學信仰為憑藉，反思佛教的「緣起性空」思想、道家的「虛無」思想和儒家的「仁義」思想，以神學的精神和價值理念貫通中國傳統文化的思想脈絡。同時，他還強調以重新建構的「中華神學」的理念和智慧對西方神學以及整體的西方文化的反思，從中西思維方式的比較研究中認識西方現代性、後現代性的深層問題，克服現代西方哲學中的「主客對立」以及後現代哲學中「自我中心主義」和「虛無主義」的困境，進而推進全球文化的更新與發展。可見，「中華神學」乃是基於聖經真理對中西文化的雙向反思，也是在新的思想高度和智慧境界對中西文化的重整和創新。一言以蔽之，「中華神學」乃是基督教聖經信仰和普世真理在當代中國處境乃至世界境遇中的系統性闡釋和理論建構。^[4]



二、中西文化的對話與會通

早在上世紀70年代，梁燕城就參與和推動了當時一場著名的基督教與新儒家的對話。對話由當時新儒家代表人物蔡仁厚和周聯華牧師發起。蔡仁厚提出了宗教會通的六個焦點問題：第一、人皆可以成為基督嗎？第二、耶穌是神而人、還是人而神？第三、人不能通過耶穌基督就不能得救嗎？第四、是耶穌獨尊，還是耶穌與孔子、釋迦同尊？第五、非基督宗教是否具有獨立的地位？第六、是基督教中國化，還是中國基督教化？蔡仁厚強調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主位立場，對基督教表現出一定的同情和理解。周聯華牧師對蔡仁厚的觀點有所回應，也有所折衷，但他堅持基督教普世真理的立場是一貫的。蔡仁厚與周聯華的對話，是歷史上未曾碰面的儒耶對話的一次真實在場的實施和體現。雖然對話雙方彼此尊重，也能從學理的層面展開，表現出相當的理論深度，但雙方仍然停留在各說各話的階段，沒有做到實質性的會通與轉化。作為參與者，這場對話對梁燕城的啟發是很大的。他發現，基督教對中國人的心靈造成的困惑，不一定來自信仰本身，而來自西方傳統神學對信仰的整理方式。因此，若只從西方神學的角度回答中國人的信仰問題，最多只能保持神學上的一致性，卻不能令中國人接納和信服。在他看來，僅僅由護教學的觀點作出回應是不夠的。他敏銳地意識到，這場對話，只是一個開始。他由此提出，要真正會通基督信仰和中國文化，必須從聖經的啟示和人神相遇的體驗開始，以中國方法重整信仰真理和福音內容。^[6]

梁燕城認為，西方傳統神學乃是聖經真理希臘化的產物，是基督信仰被安排在西方邏輯化、概念化的思維框架的結果。檢討西方傳統神學，會發現其建立的幾個預設是：在形而上學，上帝被當作概念化、實體化的邏輯思維的物件來處理。結果上帝被作為徹底外在化、超越化、物件化的實體。在知識論，是主體與客體的對立，人被作為自我的主體，而與作為客體的上帝對立起來。在人觀上，經過一套抽象的概念思維的處理，人被作為被造物的有限性的對象化的存在。要而言之，西方傳

統神學的基本精神和特徵是凸顯神人之間的對立和衝突以及神人之間不對等的關係。在他看來，這種神學思維模式根源於古希臘哲學的影響。基督信仰希臘化的一個主要方面，是運用柏拉圖哲學來解釋神學，其代表性成果是奧古斯丁的神學。基督信仰希臘化的另一個方面，西方神學家運用亞里士多德的哲學來建構神學，其代表人物是托馬斯·阿奎那。而近代以來，雖然宗教改革的領袖如馬丁·路德和加爾文都強調「回到聖經」，但是西方神學系統仍然基本上沿襲了古希臘的思想方式，將上帝作為絕對的、外在化的存有。梁燕城發現，這是中國本土文化學者不能接納基督信仰的深層思想根源。^[6]

梁燕城由此斷認，中西文化傳統的思想進路與方法是完全不同的。西方傳統神學中實體化的上帝觀並不合乎中國人的心靈和思維習慣。中國人不習慣將上帝與人設想為相互分離的「實體」，而是傾向於從整體性、關係性的範疇來認識和處理人神關係。在他看來，上帝既是超越的，又是臨在的。上帝作為一種具有位格和性情的真神，人可以通過信仰和感通的方式，與上帝溝通。他認為，西方傳統神學將上帝作為一種徹底外在化的實體範疇，造成了對上帝的限制，也阻隔了人與上帝的密契關係。相反，只有將人神之間作為一種關係範疇，才能回復和建立人神之間的圓融關係。以關係為起點，上帝與人相互臨在，主體與客體相互涵攝，從而建立一種「我在你裡面，你在我裡面」的「合而為一」的親密關係和境界。而由關係範疇來看人，人由上帝得到生命的本質，具有「上帝的形象」，即在原初的、本體的層面分有神性。而人的罪性是由後天的陷溺造成的。他確信，聖經不是如希臘哲學家一般，先構建客觀的概念系統，再去理論地搭建人神關係。聖經中所有人神相遇的事件，既是人主動地揭示自己，又是人主動地回應上帝，它們都是在關係範疇中展開。梁燕城強調人神的關係範疇，就是相信通過聖經的中介和人的信仰體驗，可以重新建立和恢復人神之間原初的和諧關係。可見，梁燕城將上帝與人作為一種關係範疇的思考，具有中國傳統哲學「天人合一」思想的濃厚的背景。^[7]

三、「中華神學」的多重理論進路

梁燕城認為，西方的系統神學與中國人的心靈格格不入。他提出，基督信仰要尋求在中華文化中生根發展之道，必須以中國的思維方式來理解和處理聖經真理。梁燕城「中華神學」建構的基本理論進路是，一方面以聖經真理為憑藉，以基督信仰為核心，來反思和重新整理中國傳統哲學；另一方面以中國哲學的思想路徑和方法，來詮釋和重新構建聖經真理和基督信仰。這兩者可謂是「中華神學」理論建構之一體兩面，也是其理論開展中並行不悖的兩個環節和進程。質言之，其「中華神學」的理論建構，乃是中國心靈對上帝信仰的獨特領悟。他從中體悟和開拓出一種獨特的「境界神學」，循此可以與中國傳統哲學展開多層面的溝通。他指出，「緣起性空是上帝從無創造天地之本，大道無形是上帝創造之規則，仁心流現是上帝賦予的靈性。儒道佛均為聖人對上帝創造秩序的真實體悟，不涉及救贖，故不同於上帝的直接啟示與人得救之道，義理上屬不同層次與範圍，只要在神學上區分創造（creation）與救贖（redemption）之不同義理結構，則信仰與中國文化處在不同義理的意義結構中，並無衝突。人若深探各教之境界，可發現是通向認識上帝的階梯。」^[10]可見，梁燕城從上帝信仰出發，從心靈境界不同層次的領悟中，開展出一套境界哲學和神學的系統。他試圖藉此作為會通基督教與中國傳統哲學的樞紐和開始。

儒家傳統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具有主流的地位。梁燕城十分重視基督教與儒家思想的會通。其主要的思路是將儒家作為宇宙本體的「天道」思想與基督教的「上帝」觀念進行比較與融合。梁燕城由聖經中上帝與人乃是一種相互臨在關係的認信，體悟出一種「雙回向」的神學建構的思想路徑。從「上回向」的路徑看，人可經由神學的反省和領悟，達至肯定上帝的境界；而從「下回向」的路徑看，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在於上帝的主動啟示，將上帝的恩典下臨人間，建立神人的親情關係。^[11]梁燕城從成中英的本體詮釋學得到啟發，並以此來詮釋孔子的儒學思想。他認為，在孔子學說中，

「仁」既是本體，又是方法。仁作為潛質的本體，須有一個將之實現的過程與方法。仁體衍生了方法，方法揭示了仁體，二者永遠處在一個互動的關係模式中。^[12]而在孟子，開啟了中國傳統儒家強調經由人的內在修養和道德踐履的理路，所謂「盡心」，「知性」而「知天」，終臻至上參天地的境界。在他看來，中國哲學的終極本體理念如天道等，雖不是具有位格的上帝，但同樣具有性情之本質。中國哲學強調從性情的自覺開始，在現實世界奉行一條遵循天命的德性生活，以歸向「天人合一」的最高理想。中國傳統儒家由天命之性內貫而展開參贊天地化育，是「由具體內在而超越」的思路。而希伯來和基督教傳統以上帝的恩情為本，但同樣肯定以人的智慧可以洞察明照，以契上帝。此則為「由超越而感通於具體內在」之思路。總之，中國儒家的人文文化型態與西方的宗教文化型態可以互釋互補。他由此思路構建其「恩情感通神學」。^[13]

梁燕城還重視基督教與道家思想的會通，以建構其「道體論神學」（Daology）。其主要思路是用道家的理念和思維方式來理解和消化聖經的啟示真理，從而創造中國思維特色的神學理論。梁氏的道體論神學主要包括兩個方面：其一是從老子哲學的理念來構架聖經真理。他認為，老子哲學中的道，乃是宇宙萬有的根源，具有虛通性、整體性和動態生成的特質，也是虛涵一切萬有的本體。可以說，老子的道體論哲學代表了中國哲學的特殊進路，與西方實體化的本體論迥然不同。^[14]他用老子哲學中的「無」、「無名」及「淵」等範疇和意象來詮釋正統神學以上帝從無中創造世界的命題，又用道家的「虛己」、「無執」的意涵來解釋基督的「道成肉身」。這是梁氏冀圖將老子哲學與基督教神學聯結起來解釋一切存在的理論試探。梁氏道體論神學的另一個方面，是用莊子哲學的理念來展示上帝啟示，解釋造物者與人遊，上帝與人在道中相遇的歷程。他指出，莊子哲學的基源問題是祛除人類思想中各種成見、偏見的限制。莊子由此展開了一個以「道樞」、「環中」為中心的思想觀點，進而開拓出「道通為一」及「逍遙遊」的自由、無待的境界。梁燕城從莊子哲學的解讀中，體會到



其中涵有某種神學的意義，其思想旨趣指向寂然不動、「無相真神」的上帝。^[13]

梁燕城將易經的和諧思維看作中國思維模式的典型。他力圖從易經的「太極」及「天、地、人」三才互動的關係模式和整體宇宙觀，結合當代科學的宇宙起源論和量子力學的成就，在中西互釋和雙向省思的基礎上，致力於探索當代中國基督教神學發展的新路徑，構建「三極感通神學」或「彩虹神學」。^[14]他認為，易經所揭示的「天、地、人」三才之道是一個整體的、互動的交互關係的宇宙模型，也是一個一體多元的本體論。易之本體，所謂「神無方而易無體」，無思、無為、寂然不動，是一個超乎有限而指向無限和超越的本體，此即宇宙中最大的奧秘，或謂「天下至神」。^[15]這也是一個多元的、與他者共在的世界得以感通和統一的終極性根源。顯見，梁氏對易學的基本觀點承自成中英本體詮釋學的理论框架而又有自己獨特的思考。^[16]梁氏通過易經和聖經的比較研究，斷認易經中的「神」與聖經中的「上帝」作為性情的、位格的神，內涵和意義接近。深入體會易經與聖經的深層奧義，從廣義上說，它們都是循著內在超越的智慧和經驗，揭示終極的奧秘和宇宙真理。這是中西文化的最高精神價值所在，也是易經與聖經得以共通共融的接合點。^[17]易經與聖經的區別在於，易經乃是從哲學的、人文的徑路達至對

最終奧秘的體驗，而聖經則是藉由「上帝臨汝」的主動啟示，展開神聖的啟示性敘事。而聖經作為啟示性敘事，可借助「性情際的」(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我-你關係」(I-Thou relationship)模式來理解。^[18]總之，上帝的存在乃是宇宙間一切萬有一體感通、和諧統一的本源。

四、「彩虹文化」的理想與當代文明對話

梁燕城「中華神學」的理論建構，首次開啟了完整意義的中西文化精神在形而上學層面的深度會通、對話的嘗試與努力。毋庸置疑，梁燕城的神學理論是基督教尋求生根中華文化的理論探索的接續和發展。梁氏「中華神學」的思想路徑，沿承了歷史上利瑪竇文化適應的神學模式和20世紀上半葉中國本色化神學建構的基本理路，但在思想方法和理論規模上都有很大的突破和拓展。梁燕城從以往的本土神學執著於從中國傳統文化的理念和範疇來詮釋基督教神學真理的單向思路，拓展出一種雙向的省思和互詮互釋的理路；而在理論規模上也不再局限於通過儒學、墨學或某一局部領域尋求中西宗教精神的會通。^[19]可以說，梁燕城將當代中國本土神學的理論建構推向了新的境界。從一個宏闊的思想背景來看，梁燕城致力於中西文化在超越性的宗教精神和價值層面的比較、

會通，也應看作現代中國文化建構理論實踐的一個重要方面。梁燕城的「中華神學」理論建構，具有突出的普世意識和當代中國的處境意識。梁氏的神哲學實質上是在一種超越性的本源意識的統領下對中國哲學的整體重建和思想创新的工作。梁燕城基於對中西雙向的批評、反省和互詮互釋的理論方法和思考，凸顯一種根源於中國文化深層的超越性精神的文化自覺，經由現代、後現代乃至「後後現代」文化的洗煉和考驗，進而歸結為中國當代處境的神學理論的整體思考和研探。其神學思想的基源問題，既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他本人對此也是有著明確的自覺意識。他正是冀望於以其「中華神學」的理論建構，一面推進中國哲學現代化、普世化的進程，一面解答當代西方文化中的理論困境和種種問題。而這恰是梁燕城「文化更新運動」的標幟和宗旨所在。^[20]

梁燕城的「中華神學」在當代中國乃至華語世界的基督教神學理論發展中，獨樹一幟，可謂當代基督教中國化的一個標誌性成果和理論成就。梁氏神學理論具有一些顯著的理論特色：首先，就其理論方法而論，梁氏從中西文化雙向的反省、批評和互詮互釋中開拓出當代中國神學建構的獨特視野。他運用中國哲學的思維方法詮釋基督教的普世信仰和啟示真理，實際上是從一種本位文化的立場致力於中西文化深層的超越性精神和普世真理的比較與融通的理論探索和神學試探。再者，就其焦點的問題意識而言，梁燕城注重用中國哲學的思維方式來闡釋聖經真理，強調「中華神學」必須與當代中國的處境相結合。其神學理論既是基於超越性精神的反省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一種整合、重建，也是對中國哲學現代化世界化課題的一種神哲學的闡釋。不僅如此，他的神學理論實際上也意在彌補西方文化的不足。其神哲學理論建構的完成，可謂是對西方文化的一種超越和升華。可以說，梁氏的神哲學理論乃是在中西整體思維的理論背景下尋求對基督教普世真理的闡釋和表達，亦可謂藉由一種超越性精神為基點對中西哲學的重整與升華。再就其神學思想之主旨而言，梁氏力圖以中西宗教精神和超越性智慧為主題，探求中西文化融合會通的連接點，其理論實質是在

中西融通的世界哲學的背景下，求索中西文化對具有整體性的、超越性的智慧和普世真理的闡釋和表達。歸約言之，梁氏經由中國哲學內在超越的形上智慧和思想型態，來闡釋和理解基督教的超越性精神和普世真理，在中西之間開闢了一條獨特融會貫通的思想路徑。

在當代方興未艾的宗教與文明對話運動中，梁燕城以中國古老的易經哲學為主幹，會通中西文化的超越性智慧和宗教精神，進而開拓出其「彩虹神學」的理論建構，愈益彰顯出其獨特的思想魅力。當代世界文明的發展面臨極大的危機和挑戰，也迎來極大的重整和新生的機遇。重建人類文明共同體，成為當下人類發展的一大主題。梁燕城早在本世紀初，就提出「彩虹文化」的構想。^[21]這其實也可謂一種將當下的人類文明提升、升華到宇宙文明的境界和水準的思想觀點。在一種宇宙本源意識、本體意識的觀照下，世界文化的民族性與普世性，地域化與普世化猶如一體之兩面，共同構築成世界文明共同體互補統一的有機整體。「彩虹」在聖經中是在災難後上帝與人類重新訂約的寓言，其五顏六色的繽紛色彩寓示著人類文明多元化的豐富色彩，它與易經哲學一體多元、和而不同的精神也是完全契合的。「彩虹文化」的理想預示著人類文明共同體的建構，不可能是一種單一型態，而是眾多文明的共同參與的複合型態。世界上多姿多彩、多樣化的文明型態，在一種宇宙本源意識的引領下必將實現一次有史以來空前的最廣泛的大聯合、大融合。這種高度的文化理想，來源於當代全球化的現實需要，也來源於各個具有悠久歷史的文化傳統對普世精神的共同訴求和表達。可以期待的是，新的世界文明共同體的建構，是在一種高度的文化精神和智慧之光的啟示和引導下，基於一種普遍的文化自覺意識的共同參與和共存共榮的結合體。在這個過程中，世界上各國家、各民族的文明不是被取消，而是得到完善和升華，它們共同參與和支撐起世界文明共同體的建構，並成為其中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而經過洗禮、沐浴上帝神性光輝的中華文化，理應擔負起其特殊的使命。



- [1] 參見梁燕城：《中華神學導論，《儒、道、易與基督信仰》（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年），第3-4頁。
- [2] 同注[1]，第5頁。
- [3] 同注[1]，第5頁。
- [4] 同注[1]，第7-9頁。
- [5] 參見梁燕城：與蔡仁厚教授及周聯華牧師對話，《會通與轉化—基督教與新儒家的對話》（宗教文化出版社，2015年）。
- [6] 同注[5]。
- [7] 同注[5]。
- [8] 同注[1]，第11頁。
- [9] 同注[5]，第11頁。
- [10] 參見梁燕城：孔子的方法學—本體詮釋學模式研究孔子哲學，《儒、道、易與基督信仰》（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年），第192，193頁。
- [11] 參見梁燕城：性情的形而上學—儒家的誠體與聖經的邏各斯和智慧，《儒、道、易與基督信仰》（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年）。
- [12] 參見梁燕城：無名與虛通—老子哲學道體論的深層詮釋，《儒、道、易與基督信仰》（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年）。
- [13] 參見梁燕城：莊子哲學的飛翔心靈境界，《儒、道、易與基督信仰》（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年）。
- [14] 同注[1]，第11頁。
- [15] 參見梁燕城：易學的感通關係本體論；參見梁燕城：易經的「神無方」與神學之「奧秘」理念，《儒、道、易與基督信仰》（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年）。
- [16] 參見成中英：《論中西哲學精神》（東方出版中心，1996年）。

[17] 參見梁燕城：《儒、道、易與基督信仰》（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年），第73頁。

[18] 同注[17]第93頁。

[19] 參見趙士林、段琦主編：《基督教在中國》（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

[20] 參見韓思藝：建構中華神學：梁燕城融通轉化中西神哲學之路，載《文化中國》2020年第4期總第105期。

[21] 參見梁燕城：彩虹文化的理想，載《文化中國》2006年第4期總51期。

Leung In-sing's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Sino-theology and His Ideal of Rainbow Culture Li Anze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Abstract: Leung In-sing's theological theory is the continu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of Christianity seeking to take root in Chinese culture. It is the first attempt and effort that his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Sino-theology" has opened up a route of holistic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in the metaphysical level. Leung has taken a unique vision of reciprocal criticism and mutual interpreta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to construct contemporary Sino-Theology. While, he uses the thinking method of Chinese philosophy to interpret the universal belief and Revelation truth of Christianity. In practice, he has devoted himself to the deep comparison and integr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al spirits from the standpoint of Native culture. So to speak, Leung's Sino-theology is a landmark and theoretical achievement of the Sinicization of contemporary Christianity.

Key Words: Sino-Theology, Rainbow Culture, cultural renewal, civilization dialogue